

## 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路在何方?

杨光斌

首先祝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系的成立!这将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复兴比较政治学的根本之道:比较历史分析》,<sup>①</sup>其中特别强调理论自觉与学科重建问题。下面我谈几点看法,供同行批判。

中国政治学的学科状况与其国际地位严重不对称,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显而易见的,原因有两点:

首先,国内政治发展的需要。中国正处在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的阶段,思想界流行着很多“好政策好制度”,而我们却不去追问这些制度和政策在一些早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很危险。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国家建设和国家转型,而我们身处在国家建设政治发展过程之中,这可能就是阶段性问题。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办,这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其次,学科发展的要求。我觉得如果没有比较政治学,整个政治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的可信性都是有问题的。我特别同意涂尔干的一句话:“知识界被虚假的知识和错误的真理所侵扰”。很多知识和真理看起来是真的,但可能是假的,这种情况在中国知识界尤其严重。很多学者只接受既定概念和理论,而不问这些概念和理论是怎么来的,这样就可能用错误的知识和观念解释现实。因此,对中国而言,随之而来的最大危险是:尽管实践上做得还不错,但精英们认为自己错了,观念上也不自信。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危险可能不是环境或者城乡差别问题,而是观念问题。所以,时代呼唤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

---

\*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100872)

① 杨光斌:《复兴比较学的根本之道:比较历史分析》,载杨光斌主编:《比较政治评论》2013年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比较政治学是各个学科知识的增长点。首先,我们所说的政治学理论方法其实源于比较经验的观察,比较政治理论又能充实、发展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这是政治学理论和比较政治学的关系。其次,国内政治和比较政治的关系。中国人对本国政治研究称为中国政治,美国人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则属于比较政治,因此二者在本质上是无法区分的。再说国际政治和比较政治的关系。其实,纵观这 20 多年,无论是苏联解体还是中国的强大都是国内政治的问题,国际政治的问题其实都只是一个果,而原因都在于国内政治。另外,比较政治的重要性,在于打通政治科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关系。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如果了解比较政治,很多问题可能都会变得容易理解。现在,在中国政治哲学界、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存在对人物解释过度的问题。其实,问题没有那么复杂。按照我的理解,西方政治思想史就是历史的经验科学。不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近代的思想家,他们都是针对当时的历史问题、重大的社会关系变化而阐发思想的,只不过他们的说话方式不一样。在古希腊的时候要隐喻地表达,到了中世纪就带点神学,其实针对的都是现实问题。所以我觉得,比较政治不仅可以打通政治科学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打通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的关系。

因此,比较政治学是知识增长点,国际上也在呼吁要社会科学一体化。那么,如何做到社会科学一体化?具体而言,政治学的各分支学科能否统合起来?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的研究过于专门化,学科整合很难做到。但是,以“问题”整合学科是可能的,用问题整合来带动学科整合可能是一个比较可行的路径。

那么如何促进比较政治专业的发展呢?

首先,研究者要有一个身份意识的问题。2012 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议程问题》<sup>①</sup>,在这篇文章里,我主要谈的是研究过程中的“方法论主义”问题。1980 年代以后美国政治学方法论应用和研究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发达,但是为什么其思想成就难以和之前的政治学相媲美?

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学和西方政治学的差距就在于有没有接受过方法论的系统训练。但是,不少在美国受过方法论系统训练的学者,回国以后为什么对方法论不再迷信?这里面就有一个语境问题,即中国人的语境和美国人的语境是不一样的。语境背后是国家的建设阶段不一样,同时他的身份意识不一样。

就前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在 1975 就职演说中提出,衡量社会科学的最高标准是,研究是否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生活进程的社会结构的理解提供实质性启示。1980 年代以前的现代化研究取得了丰硕成就,比如,巴林顿·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西达·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的革命》,以及亨廷顿和查尔斯·蒂利等人的研究。他们揭示

<sup>①</sup> 杨光斌:《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议程问题》,《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 年第 6 期。

了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是如何到来的。而现代化研究的“实质性启示”成果来自比较历史分析。

与现代化研究相比较,最近30多年的民主化研究相形见绌,启人心智的成果有限。虽然方法论越来越发达,但具有“实质性启示”研究成果却越来越萎缩,民主化研究没有超越既有的命题,如古典的亚里士多德命题、现代的罗伯特·达尔的命题。可见,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不是越新越好,不是越新就越管用。为此,我呼吁回到比较历史分析。今天历史制度主义许多要素引入之后,比较历史分析不再单单是简单的方法,而是一个理论了。

为什么今天比较政治研究取得成就更少?原因就在于对历史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中国人特别擅长历史,从司马迁到司马光,一直到近代。近现代有名的哲学家们如冯友兰,他们成名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的哲学概念,而是因为他们对哲学史梳理成名。

那么比较历史分析用于什么样的研究议程呢?前提是研究者所处的语境和身份意识问题。语境不同决定了其“身份意识”不一样,身份意识的不同带来了“问题意识”的差异。根据中国语境下的“身份意识”,我总结了比较政治学语境下的几个重要问题,它们在历史逻辑上是相互关联的。

第一,比较政治发展的道路问题。西方比较政治学强调最多的是社会中心主义、社会权利,这主要基于美国—英国经验,以及德国经验的国家中心主义。但是中国经验、俄国经验的理论体系呢?它们是靠政党组织起来的。这样的道路,这样的经验是不是给我们理论启示?为此我提出过“政党中心主义”。<sup>①</sup>

第二,国家建设的秩序问题,就是阶段性问题。自由、法治、民主在早发达国家、工业化国家的国家建设中,分别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西方民主其实在早发达国家中出现很晚,最重要的是自由和法治。比较政治学往往侧重于求异,其实求同也很重要,比如,现代化道路可能不一样,但国家建设中的秩序则有着共同性。

第三,治理危机问题。任何国家在政治发展或国家建设中都会出现治理危机,这是一个中观问题,是一个连接各重大问题的关键点,如社会运动、民主化、大革命、政治制度、国家类型、民主、宗教,等等。它在危机治理的框架内可以体现出来,这就是一个中枢性的问题。

第四,政府质量。研究比较政治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也不是为了某种理论目标,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这就离不开治理质量这个命题。西方学界研究民主化,他们第一个阶段研究民主怎么发生,第二个阶段研究民主怎么巩固。其实,所谓巩固的民主没有什么了不起。从治理质量而言,印度、菲律宾等国的民主政治并不值得羡慕。

上述研究议程在逻辑上是紧密相关的。在中国语境下,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的身份意识。

<sup>①</sup> 杨光斌:《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